

烏托邦諷刺：老舍《貓城記》批評重探

劉恆興*

摘 要

本文寫作目的有二，首先檢討以西方烏托邦小說理論研究老舍《貓城記》之成果。在相關研究及討論中，烏托邦諷刺及反面烏托邦理論往往兼用。不同理論固然皆能開啟對文本新的閱讀方向，但二者究竟有何區別，小說文本就文學史角度又應如何詮釋與歸類，仍必須透過對理論及文本的實際分析，方能產生合理的答案。其次，老舍作品確實受到傳統文學影響，《貓城記》亦非例外。但此作品於中國新文化運動之間所作，在此文化交融衝突時期，傳統與西方文化相互影響，在所難免。因此本文嘗試就傳統文學表現虛擬世界與諷刺主題作品中，分析並歸納其與西方文學不同特徵，並以此為基礎，配合文本創作時之時代背景與作者境遇，說明西方烏托邦文類理論如何滲入並與中國小說傳統結合，以及對作家創作之實際影響。

關鍵詞：老舍、貓城記、諷刺、烏托邦、五四

* 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文史系專任助理教授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貓城記》為老舍（本名舒慶春，1899-1966）第五部小說。本書於1933年出版，描寫太空探險迫降火星後，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在「貓國」的遊歷見聞。

《貓城記》受到研究新文化運動與老舍作品學者普遍重視，並被視為受西方烏托邦小說（Utopian novel）影響的作品¹。本書創作相關背景與研究資料，並不難尋，但作品具有的矛盾特性，和其帶給作者的災難，卻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中令人困惑的課題之一。本書中，老舍以寓言諷刺性呈現及探討中國前途問題，使得作者立場及作品主題，至今仍不斷產生爭議。在強求個人政治立場正確的年代，老舍甚至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究竟如何客觀定位作者的態度，《貓城記》在形式及主題內容上又該如何歸類？首先將配合烏托邦文類中烏托邦諷刺（utopian satire）與反面烏托邦（anti-utopian fiction）定義與理論，對此問題做進一步界定與釐清。

為求客觀周延，本文亦將探究《貓城記》諷刺寓言手法與傳統文學間的關聯。老舍曾於英國講學，對西方文學傳統並不陌生，西方烏托邦小說理論和作品曾影響《貓城記》的看法，確實有其依據。但是在研究老舍作品時，中國文學傳統的影響是更加不能忽略的因素。誠如蒙若（Munro S. R.）所指出：「雖然表面上老舍在其諷刺作品中，使用西方的觀點和技巧，但卻顯示更多對中國傳統文學主題和技巧層面的依賴。」²職是，在《貓城記》相關研究討論中，研究者往往熱心地指出此作品與傳統文學，如《鏡花緣》及晚清譴責小說的關係。然而卻往往流於表面，甚或自相矛盾的窘境。³

因此，在探討傳統小說的影響時，本文將探討下列問題，並嘗試解決此一時

¹ 學者如王德威、何冠驥等，均曾以反面烏托邦小說理論探討此作品的藝術成就及內蘊意識。見 David D. W. Wang, "From Mimicry to Mimicry: The Biography of *Niu Tianci* and *The City of Cats*," *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5-139; Koon-ki Tommy Ho, "Cat Country: A Dystopian Sati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3 (1987): 71-89. 史承均，〈「貓城記」與西方「反面烏托邦小說」〉，第一屆國際老舍學術討論會論文，1992。參見王潤華，〈老舍研究的新起點——從首屆國際老舍研討會談起〉《老舍小說新論》（台北：東大出版社，1995），頁250。

² S. R. Munro, *The Function of Satire in the Works of Lao She*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Press, 1977) 56，案：本文所用外文資料，除有特別標出者外，為筆者所譯。

³ 以研究者闡釋《貓城記》出版後情況為例，該小說一問世，即為多數中國批評者視為失敗作品。吊詭的是，該小說卻大受當時中國讀者歡迎，在一九四九年即已再版七次，同時，西方批評家對此作品亦贊譽有加。對此一特殊現象，何冠驥的解釋為，此小說「以西方文學形式為創作標準，對於中國文學批評者而言，這種標準與中國傳統文學觀念差距過大，以至於使其無法認同此一作品。」此一意見顯然與傳統小說對《貓城記》影響見解衝突。同時亦不免啟人疑竇：中國讀者不見得較批評家們更熟悉西方烏托邦傳統，但何以對此小說如此喜愛？有關當時批評者意見，參閱陳政文，〈應該怎麼評價老舍的貓城記〉收錄於《老舍研究資料》（北京：北京實業出版社，1983），頁844。老舍個人意見參見〈我怎樣寫貓城記〉收錄於老舍，《老牛破車》（香港：南國出版社，1976），頁39。何冠驥（Koon-ki Tommy Ho）意見參見Ho，同註1，74。

期，由於中西文化交融，在文學研究上所產生的難題與困境。首先，中國以虛擬想像之世界為諷刺主題的小說有何特色？此一傳統與西方烏托邦文類在理論和作品表現上有何異同？其次，以老舍《貓城記》為例，討論西方烏托邦文類理論如何滲入，並與中國小說傳統結合。在此基礎上，期待對《貓城記》在中國諷刺小說發展史的地位，有更明確認識與掌握。

貳、《貓城記》與烏托邦式小說之關涉

西方烏托邦小說由想像及真實兩個不同世界所組成。然而烏托邦小說所以有別於其他以想像為主題之文本，如科幻小說，在於提供兩個世界間隱含的聯繫。⁴作者往往將個人對現實社會所持臧否意見，投射在烏托邦作品的幻想世界中。烏托邦諷刺小說和反面烏托邦小說，雖同屬烏托邦一類，但不管在寫作手法及主題上，二者皆明顯不同。在批判現實的前題下，烏托邦諷刺作品以滑稽嘲諷的仿擬 (burlesque) 手法，揭露人們習以為常，卻荒謬不合理的世態。反面烏托邦作品則透過誇張的描寫，以預言未來的方式，對人類企圖創造烏托邦世界的理想提出警示。⁵而就文類所具特色而言，烏托邦諷刺作品，如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雖然意在批判，所持仍是積極進取態度。反面烏托邦小說卻是在二十世紀追求科技與機械文明進步的環境下發展的文類，因此如赫胥黎 (Leonard Huxley, 1894-1963) 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等作品，由於懷疑工業文明帶來的社會進化，態度則往往趨向消極而悲觀。⁶

多數學者將《貓城記》視為反面烏托邦作品，但仍有學者持反對意見，以為應屬烏托邦諷刺一類。⁷後者主張較為恰當，但由於缺乏專論，反對意見往往徒具觀點，而未見實際比較分析。儘管反面烏托邦與烏托邦諷刺二者，的確存在相

⁴ 見 Raymond Williams, "Utopia and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5 (1978): 203-14.

⁵ 有關二者分別之討論繁多，而其理論運用層面之廣，已非單篇論文所能涵蓋。本文所討論僅為研究老舍《貓城記》學者所專注處，即創作手法與目的。與此相關理論參見 Juan Lopez-Morillas, "From 'Dreams of Reason' to 'Dreams of Unreason,'" *Survey* 18 (1972): 54; Mark Hillegas, *The Future as Nightmare: H. G. Wells and the Anti-utopians* (Carbondale: Edwardsville, Southern III UP, 1967) 9; 楊小定, 〈論烏托邦旅程〉《從影響研究到中國文學》, 陳鵬翔、張靜二編 (台北: 書林書局, 1992), 頁 174-5。

⁶ 見 John Clark, *The Modern Satiric Grotesque and Its Tradition*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1) 138-47.

⁷ 何冠驥, 〈《桃源夢》與《遠方有個女兒國》〉《中外文學》十九卷, 第五期, 1994, 頁 24-5。反對將《貓城記》視為反面烏托邦的意見, 參見張惠娟, 〈反烏托邦文學的諧擬特質〉《中外文學》, 十七卷, 第八期, 1993, 頁 137-9。

互滲透的可能，⁸但《貓城記》卻具有不容混淆的主題與特色。因此作品分類的工作，仍有待釐清。

主張反面烏托邦作品者，意見可以歸納為兩點：第一，《貓城記》缺少老舍一貫擅長的滑稽幽默文風，與之前作品對比下趨於悲觀。其次，作品中的火星世界與現實缺少聯繫，無法提供批判現實層面時的直接參照。⁹老舍借此作品反對改革，並對中國未來提出悲觀預測，故《貓城記》為反面烏托邦小說無疑。

但前述論點仍有檢討的必要。首先，就文風轉變而言，《貓城記》誠然不似之前作品，如《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等幽默風趣，但卻不能說其態度轉向消極。相反的，相較於之前幽默但具有濃厚虛無主義（nihilism）色彩的寫作風格，¹⁰老舍在一九三二年後轉向積極批判現實。在〈我怎樣寫貓城記〉中，老舍清楚表明，是基於對當時中國社會反感，而提出譴責。¹¹《貓城記》既是作者從早期嘻笑怒罵的嘲諷態度，轉到認真嚴肅批判現實的過渡階段作品，自然會出現晚期如《駱駝祥子》（1936）般嚴肅的風格。《貓城記》確實具有悲觀意味，但是就此認定作者及作品表現消極，定位並不夠周延；換言之，悲觀與消極間並不能如此輕易畫上等號。

就與現實聯繫而言，由於敘述者並未明確交待故事時間（story time），可以說《貓城記》是設定在未來的小說。但是讀者理解貓國與現實世界不同，多半是透過貓國位於火星此點得知。空間因素顯然較時間因素起著更重要作用。因此，《貓城記》主題仍是利用空間的錯置，表達對當時社會現象的批判嘲諷，而非以呈現未來方式，提出反對改革的意見。在情節安排上，小說並未脫離作者當時社會，而設想未來可能有的影響與改變，亦非作者意圖。¹²

但以反面烏托邦小說解釋《貓城記》，更可能是對作者態度，甚至對中國現代發展過程理解有誤。認定小說預示未來，可能是過度強調、甚或誤解達爾文主義（Darwinism）的影響。由於達爾文主義中人類與動物有共同始祖，以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具有指示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意義。因此，《貓城記》針對現實而發的諷刺，似乎也不能不循達爾文主義思維，做出貓國覆亡、貓人滅絕的設想。《貓城記》本是表現中國在西方列強勢力圍繞下，力圖變法圖強，但又歸於失敗的歷史。作品強烈攻擊了中國改革過程中，個人私欲、社會習性導至的缺失。如果配合上述基於達爾文主義所作的負面推想，的確可能得出：「所以，

⁸ 以何冠驥（Koon-ki Tommy Ho）討論為例，研究者雖主張將《貓城記》歸於反面烏托邦小說，但於實際分析過程中，仍運用烏托邦諷刺作品理論，並以為《貓城記》堪稱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較全面的烏托邦諷刺作品。Ho，同註1，74。

⁹ 同上，頁72。

¹⁰ 見 Cyril Birch,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Fic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Ed. Goldman, Mer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77) 391

¹¹ 老舍，同註3，頁42。

¹² 老舍本人也承認這一點。同上，頁41。

貓國所經歷的理想邦式革命，不但不能富國強兵，反而使國家淪為一個絕望邦（dystopia）。無疑，老舍是透過貓國的命運，對理想邦的可行性（feasibility）提出質疑。」¹³的結論。

但是結論的有效性卻值得懷疑。首先，雖皆以探討人類未來發展為主，達爾文主義與反面烏托邦思想卻有明顯不同。前者肯定各物種改變現狀的努力，主張積極進取，求新求變，以圖種族強盛，後者卻用以表達對人類追求理想的恐懼和絕望。二者間差異十分明顯。

其次，在近代追求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經歷數次不同階段的發展與挫折。老舍的攻擊，著重在揭露社會黑暗，並將社會病態根源歸之於思想與人性腐敗。此種觀點，乃是五四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而本時期的改革，便是所針對是清末維新運動失敗，企圖將改革拓展到精神、文化與制度面的革新。¹⁴作者不僅未反對，相反是堅定支持這樣的改革。小說出現達爾文主義觀點，便是在時局危急下，焦慮的作者對改革進程停滯，中國仍處落後情況而發的警示。

所以《貓城記》寫作藍本是現實社會，而「貓國」是當時社會縮圖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¹⁵雖然在尖銳的筆鋒下，貓國社會腐敗似乎一覽無遺，但是作者對國家、社會富強的理想願望，並不因為尖刻諷刺而有改變。老舍仍應是尋求的烏托邦理想，攻擊社會黑暗與病態，包含已然失敗的改革。¹⁶

如不考慮作家創作歷程和作品產生的背景，單純就某種文類形式特徵與作品進行對比，誠然可以得到若干符節的結論。但是說法適切與否，則往往值得關注。將《貓城記》視為反面烏托邦作品的詮釋，固然有助於讀者在閱讀《貓城記》時，產生全新的理解，但是對創作者及作品而言，極可能造成扭曲，甚至傷害。認定老舍悲觀以為改革將導至中國的「滅亡」，不僅與作者思想矛盾，且與人有「欲加之罪」之感。¹⁷《貓城記》誠然有因時局而產生的悲觀情緒。但顯然必須就不同的方向思索，方能提供更為恰當之解釋，而不應附會反面烏托邦作品反改革的

¹³ 何冠驥，〈《桃源夢》與《遠方有個女兒國》〉，同註8，頁24。案：文中英文為筆者按研究者註釋所加。

¹⁴ 見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台北：桂冠公司，1989），頁19。

¹⁵ 相關意見可參見〈貓城記書評〉收錄於《老舍研究資料》，1976，同註3，頁745；〈老舍與外國文學〉，同前，頁1010。

¹⁶ 例如小說敘述者曾想道：「貓人並非不可造就的，看他們多麼老實……這樣的人民還不好管理？假如有好的領袖，他們必定是最和平，最守法的公民。我睡不著了。心中起了許多許多色彩鮮明的圖畫：貓城改建了，成了一座花園似的城市，音樂，雕刻，讀書聲，花，鳥，秩序，清潔，美麗……。」老舍，《貓城記》（香港：匯通書局，1973），頁72。

¹⁷ 老舍於文革期間遭受整肅，於一九六六年八月間，溺死湖水之中，一說自盡，即導因於對《貓城記》小說的評價。《貓城記》在中國遭受之批評，可以下述說法為代表：「作品（貓城記）抨擊各級當權者的腐敗墮落，諷刺麻木愚昧的民族痼疾和崇洋媚外的奴才心理，對舊中國的黑暗現實作了尖銳有力的批評揭露，告誡人們中國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但與此同時，也流露出對於國事的悲觀情緒，和對於革命的嚴重誤解。」見樊駿，〈老舍的文學道路〉收錄於舒濟編《老

態度。

《貓城記》雖非老舍最好作品，卻非如作者自承是一部失敗的小說。¹⁸若是不顧其思想主題，勉強將其視為反面烏托邦小說作品，而與其他批判西方人類社會文明進化鉅著，如前述《美麗新世界》或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一九八四》比較，則不僅在藝術性及主題深刻程度上，都不及西方同類作品。然而這種結論，卻並非作品本身，而是基於類比不同文類作品所造成。

參、中國虛擬式諷刺傳統之影響

然而更應考慮的因素是，老舍並未完全以西方文學定規（literary conventions）創作《貓城記》。基於受威爾思（H. G. Wells）作品《月球上的第一人》（*The First Man in the Moon*）啟發的說法，學者往往朝向西方烏托邦小說傳統，尋求研究詮釋《貓城記》的適切角度。但老舍及研究者都已承認，傳統以想像世界為題材的小說有同樣、甚至更重要的影響。

魏晉時，陶淵明（365-427）即創作〈桃花源記〉刻畫想像世界。學者有以「桃花源」即為中國最早的烏托邦。¹⁹理想桃花源的廣受中國士人喜愛，在後代文學作品中，其內容意義及表現形式不斷擴充，以至於「桃花源」一詞在中文詞彙中，與「烏托邦」有堪稱同等重要的文化意義與內涵。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指出，無論呈現何種形式與主題，烏托邦作品的觀念與創作動機脫離不了社會與政治等群體性的意圖。²⁰對比之下，「桃花源」的意義層面自始即有不同。最明顯的差異，在於桃花源在社會或政治意義之外，更具體呈現屬於私人領域的理想世界。²¹而桃花源所反映個體生命的思考，卻不是由單一角度可以解釋。魏晉此類作品的產生，明顯受老莊思想影響，但除道家式返回自然之欲望外，亦包括對社會平等及免受政治壓迫等此時期的思想產物，以及如情慾滿足及長生不老等人類共同願望在內。

這些個人理想，卻多數與現實環境衝突。而中國文學中此類作品的悲觀色

舍選集》（台北：大台北出版社，1990），頁251；相同觀點亦見北大學者溫儒敏，〈論老舍的文學世界〉，《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1997，第七期，頁386。

¹⁸老舍，1976，同註3，頁78。

¹⁹見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頁54。

²⁰見 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1971-1986*. 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75-102.

²¹傳統以想像世界為主題的作品，不僅可以在精神意念上提供理想存在的可能，調解個人與現實社會衝突，也可以幫助個人與命運間對立提供化解之道。陶淵明創作〈桃花源記〉，實乃基於作者對當時政治環境不滿和厭倦，因而細究其作品原型（archetype），可說是發自人類對「他界」（Other World）的幻想。在這種對所謂「仙鄉」世界的描寫中，中國作者投射自我本身對生命理想的渴望。參見李豐楙，〈六朝道教洞天說與遊歷仙境小說〉，《小說戲曲研究》第一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頁3-52。

彩，起因便存在於這樣衝突中。儘管魏晉時代以他界仙鄉為主題之作品，很少直接批判現實社會現象，但由想像和真實世界的對比，很容易發現作者寄托的諷刺。²²即作品所展現現實環境或生活中某些具體特徵，並非透過直接描述，而是經過個體的扭曲投射，²³可視為對現實社會一種顛覆與嘲弄。但也由於現實環境中，個人力量始終居於弱勢，作品往往透顯理想是可望不可及的悲觀意味。

由於中國文化本身複雜，學派間思想的差異與對立，因此虛擬想像題材在出現後不久，意義上便產生變化。雖然主題仍是表達個人理想與現實社會衝突，想像世界卻不再用以寄托理想，反而成為反省批判現實的工具，其諷刺意圖也顯著加強。唐人傳奇小說如〈枕中記〉、〈南柯太守傳〉即為例證。唐代這類作品主題——淑世理想如同鏡花水月——自然是受道家及道教修鍊長生與佛家虛無思想影響。²⁴就放棄追求空幻的淑世理想而言，唐人傳奇中部份作品，實有某些反面烏托邦的意味。

偽托想像以諷喻現實作品，在傳統白話小說中有長足發展，尤以李汝珍《鏡花緣》最引人注目。其諷刺性描寫及所表現之社會與政治意義，在民國初年便廣泛引起學者討論。²⁵該作品的諷刺，無論在描寫和意義層面上都有所拓展，但並未跳脫出個人理想與現實社會衝突的格局。於古代神話如《山海經》獲得靈感而描寫的海外想像世界，雖對現實社會現象提出批判，主角唐敖卻仍舊是追求個人生命價值意義的人物。其周遊海外各國目的，並非在求淑世，而是求個人生命之自由解放。因此，最終出世問道求仙的情節發展，並不使人訝異。

晚清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階段。在此階段作品中，主題風格或表現技巧，都因西方文學影響而有不同轉變。由於類型題材的類似，西方烏托邦諷刺性的政治小說，在晚清廣受到力求社會改良、文以載道讀者們喜愛，²⁶在中國作品中更加強批判現實意義。當時除翻譯外國作品，如《月界旅行》外，中國作者亦創作不少模仿作品，如《烏托邦遊記》，《月球殖民地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及《中國興亡夢》等。此外，想像世界題材於晚清譴責小說中亦被廣泛使用。例如在劉鶚《老殘遊記》，李寶嘉《官場現形記》，曾樸《孽海花》及旅生《癡人說夢記》中，都曾呈現類似題材。

中國藉描寫想像以諷刺的作品，批判社會的特點與烏托邦諷刺並無二致。但在表現手法及態度上，則有顯著不同。西方的諷刺（satire）起源與喜劇（comic）

²² 例如魯迅便已注意到六朝鬼神志怪書的作者或編者，如陶淵明等，乃是偽托作品以表達個人想法及觀念。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里仁書局，1992），頁 39。

²³ 見李豐楙，同註 21，頁 40-1。

²⁴ 見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 96。

²⁵ 胡適曾將此小說與《格列佛遊記》做比較並研究其女性主義。見胡適，〈鏡花緣引論〉，收錄於《胡適文存》第二冊（台北：遠流出版社，1988）。此外李辰冬亦曾討論其中之國家主義。見李辰冬〈鏡花緣的價值〉，收錄於《文學欣賞的新途徑》（台北：臺灣三民書局，1984）。

²⁶ 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台北：久大出版社，1990），頁 120。

有極密切關係，²⁷因此模仿嘲弄，引人發笑成爲主要文類特徵。而中國所謂諷刺，不僅批判現實，如上述所言也包括理想與個體命運的詮釋。也因此傳統諷刺小說多半「戚而能諧，婉而多諷」²⁸。尤其是結合想像世界的諷刺，更以戚婉爲主要特色，如《紅樓夢》便藉寶玉的夢境預示強烈悲劇色彩。晚清作品雖然因時衰世易，轉變成爲以「辭氣浮露，筆無藏鋒」²⁹爲主的譴責小說，描寫往往流於刻深，指斥之切，過於鋒刃，與西方滑稽諷刺（comic/farcical）有合流之趨勢。但在夢境及想像世界的運用，對照書中實際描繪之情節，卻仍保持傳統諷刺的戚婉低沉。即便是晚清時期追求國家進步，個人與群體間難以突破或改變的關係與力量對比，仍是小說作者關懷的重點，並往往透過想像世界或夢境加以突顯。³⁰但時局危急，不容採取獨善其身的做法；欲以個人力量改變群體觀念，又始終難以達成，因此晚清小說描繪想像世界或夢境時，普遍呈現進退失據的無奈之感。

中國虛擬想像世界作品的存在，無疑模糊了西方反面烏托邦與烏托邦諷刺間某些定規與分野。若論及傳統虛擬式諷刺對後世作品的影響，首先便不能不注意到因個人與群體對立，此類諷刺小說普遍呈現悲觀預期的特色。

其次，此類小說所預示個人命運的悲觀色彩，及晚清譴責小說中的無奈與失落感，雖容易令人聯想起西方反面烏托邦作品。但標舉反對某種改變社會現狀的計畫，或企圖阻止實現某種烏托邦理想，卻並非大多數中國此類諷刺作品的主題。雖然儒道釋三教在理想及教義上的不同，提供反面烏托邦作品在中國發展有利的環境，但誠如夏志清（C. T. Hsia）所指出，在小說發展元明清三朝的通俗市井環境中，三個學派都在衰微，彼此在教義上的區別已經模糊。³¹傳統小說所表現混合主義中，難以有真正完全「以此非彼」的立場出現。因此反對改革理想的主題，多出現在如前述晉、唐文言敘事作品中，³²傳統白話小說中反不多見。

晚清譴責小說更無疑改變原先出世逃避的色彩，而普遍支持社會改革。西方所仗恃的船堅砲利，帶給中國知識分子強烈震撼。面對「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雖有維新派與保守派之爭，但「富國強兵」卻是當時知識分子普遍接受的理想。

²⁷ 見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57) 224.

²⁸ 魯迅，1992，同註 23，頁 199。

²⁹ 魯迅，同上，頁 261。

³⁰ 關於晚清小說中想像、夢境運用與主角間的關係，參見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Narrative Modes in Late Qing Novels," *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ed.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 60-1.

³¹ 見 C. T. Hsia, "Introduction,"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0-1.

³² 事實上，即便是在早期諷刺作品中，雖是基於道家自然無為及佛家清靜寂滅想法，而支持追求個人理想，所持亦非如西方反面烏托邦小說般堅定決然反對社會改革的立場。但若以爲「二十世紀前中國並沒有反烏托邦文學，到本世紀三十年代，才有反烏托邦文學出現。」亦值得商榷。見何冠驥，〈《桃源夢》與《遠方有個女兒國》〉，同註 8，頁 25。

晚清小說雖呈現極端複雜的思想背景，其實不外乎要求改革以求維新與富強。³³但在追求改革進步時，晚清作者卻習慣性提出負面批評，攻擊不滿之社會現象，甚至對於支持的改革運動亦然。小說作者相信批評是加速革新的助力，使得譴責與暴露黑暗成爲主要特色。但強調破壞而忽略建設，卻也模糊作者支持改革的態度立場。

綜前所述，傳統虛擬式諷刺作品無論在悲觀情緒，與因譴責暴露等所呈現的立場模糊上，皆與西方烏托邦小說不同。然而這些不同之處，卻是在討論深受晚清小說影響之老舍作品時，不能不考慮的因素。

肆、《貓城記》之藝術成就及地位

《貓城記》之悲觀情緒是否出自個人對群體的無奈，以及作者用意批判現實社會，抑或是反對改革等等的討論，學者意見紛歧，已見前述。面對爭議，單就作品主題及影響源流討論，仍未爲完全。爲求慎重起見，下文將深入探討文本中諷刺的手法，及敘述人態度。冀望透過實際分析，提出更客觀的印證，也能對作品作爲一整體的藝術構思，有進一步瞭解。

一、結合新舊的諷刺現狀手法

《貓城記》記述一人類太空船於火星失事墜落，而唯一的倖存者，發現自己置身於最古老國家——「貓國」之中。「貓國」原是文明領先的國家，但由於「迷葉」流行，人民因循苟且，使得這個民族趨向沒落，最終在內鬥及外患中滅亡。小說中所描寫，正是敘述者對「貓國」社會中腐敗現象的觀察和討論。

合理解釋書中象徵及比喻用法，可以明確掌握作者諷刺當時腐敗頹唐現象的用心。如「迷葉」比喻危害中國社會民生甚鉅的鴉片：

五百年前，他們是種地收糧，不懂甚麼叫迷葉。忽然有個外國人把牠帶到貓國來。最起初只有上等人吃得起，後來他們把迷樹也搬運了來，於是大家全吃入了癮。不到五十年的工夫，不吃牠的人是例外了。

³³ 誠如阿英所指出的：「幾乎是全部的作家，除掉那極少數極頑固的而外，是有著共通的地方，及是認為除掉提倡維新事業，如興辦男女學校，創實業，反一切迷信習俗，和反官僚，反帝國主義，實無其他根本救國之道。」阿英，《晚清小說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37），頁168-70。

吃迷葉是多麼舒服，多麼省事的；可是有一樣，吃了之後雖然精神煥發，可是手腳不愛動，於是種地的不種了，作工的不作了，大家閒散起來。³⁴

其他書中描繪的社會現象與變革，也很容易在晚清與民國前期時局找到對應。使得「貓國」呈現中國在列強環伺，力圖變法革新，卻終於失敗的歷史縮圖的說法，一開始便得到合理的證明。³⁵

而小說中最重要的，便是人與貓的比擬。雖然「非人」做為諷刺主題，可以推源到明清小說，如《西遊記》及《鏡花緣》。但是將人類與其他動物同等類比，並強調其動物性，不能不說是晚清發展出，並普遍運用的諷刺寫法。如《官場維新記》中便明白揭示達爾文主義，並將腐敗官僚指為猴、狗之輩。也因此，晚清譴責小說描繪當時光怪陸離、頹廢荒唐社會景象，往往帶有強烈「荒誕」（grotesque）意味。

中國諷刺小說中，固然也有「打諢」一類作品，但在溫柔敦厚的詩教觀念影響下，此類作品並不被推崇。相反的，西方諷刺文學中荒誕性描寫卻不可或缺。做為表現人性黑暗面的一種方式，「諷刺作家往往利用荒誕做為鏡子，反映時代的渾沌與錯亂。」³⁶晚清由於時代背景，創作不復蘊藉敦厚。在前所未有的變局下，作者社會使命感顯得無力，甚至道德立場模糊，加上西方作品大量翻譯傳入等種種因素，使得誇大表現怪誕社會現象，成為晚清小說主要特色。老舍早期作品深受晚清小說影響，學者已指出其「善於利用富於想像力語言、鬧劇性情節、以及民俗荒誕描寫的作家。」³⁷《貓城記》自然也具此特色。在小說中，「貓國」人民之動物性格，可以說是作者著墨最深之處。例如主角試圖改變「貓人」飲食衛生習慣，遭到「貓人」抗拒時言道：

³⁴老舍，《貓城記》，同註16，頁27。

³⁵誠如 Rabir Vohra 所認為：「《貓城記》中，有相當多關於老舍對中國社會政治及歷史態度及看法的資料。」Rabir Vohra, *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74) 63。

³⁶Clark，同註6，21。

³⁷David D. W. Wang, “Radical Laughter in Lao She and His Taiwan Successors,” *Worlds Apart: Recent Chinese Writings and Its Audience*, Ed. Howard Goldblat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0) 45.

伸手就打，是上等貓人的尊榮；也是下等貓人認為正當的態度。我怎麼辦？我不願打人。「人」在我心中是個最高貴的觀念。但是設若不打，不但僅是沒有人送飯，而且將要失去我在火星上的安定。沒法子，只好犧牲了貓人一塊（很小的一塊，憑良心說）頭皮。行了，草蓋不再開著了。這幾乎使我落下淚來，什麼樣的歷史進程能使人忘了人的尊貴呢？³⁸

甚至是直接由人物評論加以攻擊：

「原諒我，」我問：「貓國的所以這樣貧弱是否因為外國聯合起來與他為難呢？」

「有那麼一點。但是，在火星上，武力缺乏永遠不是使國際地位失落的原因。……我們承認別國有許多對貓國不講理的地方，但是，誰肯因為替沒有國格的國說話而傷了同等國家的和氣呢？火星上還有許多貧弱國家，他們並不因為貧弱而失去國際地位。國弱是有多種原因的，天災，地勢都足以使國家貧弱。但是沒有人格是由人們自己造成的，因此而衰弱是惹不起別人的同情的。」³⁹

從此角度出發，許多描寫不僅怪異而充滿鬧劇色彩，甚至有晚清小說般荒謬駭人聽聞的情節。以第十五章情節為例，大使夫人自述與其他八個小妾爭奪大使

³⁸ 老舍，《貓城記》，同註16，頁35。

³⁹ 老舍，《貓城記》，同前註，頁80。

歡心始末，置於晚清小說中，竟有令人無法辨別的效果。⁴⁰此外又如「貓國」中每所學校都成爲大學，所有入學學生在第一天都獲得最高榮譽畢業，教員領不到薪水長達二十五年，以及學生與老師間種種鬥爭，已然異想天開。若如敘述者所目睹學生解剖老師與校長，則荒謬之甚令人嘆爲觀止，似足以與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一七二九年建議將愛爾蘭兒童取代英國市場販賣肉類的諷刺，前後輝映。似此描寫，如巴赫金（M. M. Bakhtin）所指出，顯然是以鬧劇表現方式顛覆現有不合理，人們卻習以爲常的觀念或秩序，⁴¹本身即具有強烈諷刺意義。

老舍批判方式又不僅得力自晚清小說。由於《貓城記》故事背景設於想像世界，作者得以在將現實事物主觀概念化後，以特殊隱喻方式表現。這種老舍稱之爲「奇想」（whimsicality）的諷刺寫法，加重了諷刺意義，卻較少事理揭示或闡明，因此亦不能視爲對未來的客觀預測，僅可說是某種主觀意念的顯現。⁴²如強調「貓人」的群眾盲從心理時，小說有這樣的描繪：

可是，一聽見音樂，人們全向隊伍這邊擠，擠得好像要裝運走的豆餅那麼緊。我心裡說：大蝎若能穿過去，才怪！哼。大蝎當然比我心中有準。只聽啪嗒啪嗒啪嗒，兵丁們的棍子就像唱武戲打鼓的那麼起勁，全打在貓人的頭上。人潮裂了一道縫。奇怪的是人們並不減少參觀的熱誠，雖是閃開了路，可依舊笑嘻嘻的！棍子也並不因此停止，還是啪嗒啪嗒的打著。我留神看了看，城裡的貓人和鄉下的有些不同，他們的頭上都有沒毛而鐵皮了的一塊，像鼓皮的中心，大概是為看熱鬧而被兵們當作鼓打是件有歷史的事。經驗不是隨便一看便能得到的。⁴³

⁴⁰事實上，在《官場現形記》四十九回，也正有類似的情節描繪。

⁴¹見 Michael Holquist 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by M. M. Bakhtin*,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237.

⁴²以老舍自己的話來說，這類諷刺寫法的特色是「比有個道德的目的，以笑來矯正或誅伐。」老舍，1976，同註3，頁76。

⁴³老舍，《貓城記》，同註16，頁72。

這種抽取事物原有形象的部份特色，借以另塑新形象的諷刺方法，在《鏡花緣》或《西遊記》中屢見不鮮。可以說是傳統想像類小說的特色之一。老舍更以獨特幽默的創作才華，賦予時代特色。然而這類諷刺的傳統筆法，在《貓城記》中並非主要表現方式，且如學者注意到，這類描寫在開始後不久，便逐漸被鬧劇式諷刺所取代。合理的解釋與推想是，小說越接近於老舍所處時代，現實所帶來痛感超越原本藝術構思，奇想式諷刺已無法宣洩其憤怨不滿。老舍作品，誠如日本學者尾坂所指出，具有一種循環：開始覺得好笑，但深刻想去又感到絕望。⁴⁴但在《貓城記》中，作者絕望情緒顯然超過幽默興致，以至於嘲弄性描寫在篇幅比例上高過奇想式諷刺。考量小說整體諷刺風格，不能不說較接近晚清譴責的筆法。

《貓城記》另一個結合中西文學諷刺傳統的特色，便是王德威指出「語言的顛覆」(linguistic Carnival)。⁴⁵在描述「貓國」語言時，可以看到利用語言結構差異對社會習俗觀念的批判：如「總之，迷葉是萬能的，有了牠便可以橫行一世。『橫行』是上等貓人口中最高尚的一個字。」⁴⁶又如「『殺人成了一種藝術，』我說。貓語中沒有『藝術』，經我解釋了半天，他還不能明白。」⁴⁷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透過語言「能指」和「所指」間矛盾，非難當時的社會現象。雖然由於中文中較難創造新字，《貓城記》無法像歐威爾為正統英文添加新詞，但如以「國魂」表示金錢，同時象徵鴉片造成白銀外流問題，以「鬩」表明黨派只知鬥爭而不知團結，都是具有特色的創造。老舍並以俄語「夫斯基」做為詞尾成為身份與學識修養代名詞，辛辣地諷刺當時盲目崇洋，無知且自卑的知識階層。這種顛覆語言的特色，並非小說獨創，⁴⁸但老舍卻能在原有基礎上，不受同音侷限，力圖創新，更是基於對想像世界主題深刻的認識，為文類新增的創意。⁴⁹

無論是語言顛覆、奇想式諷刺筆法或突顯事件的荒謬，批判對象都是社會的黑暗，而非社會改革。以貓國教育失敗為例，老舍攻擊當時中國教育的種種缺失。但若認為作者反對教育改革，或設置新式學校以引進新知識，則誠屬過度、甚至扭曲解釋。即便就今日西化與共產主義實驗失敗後的立場觀之，此種保守考量未必全然不合理，亦未免使《貓城記》作者背負不可承受之重。

⁴⁴ 見尾坂德司，《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65），頁128。

⁴⁵ David D. W. Wang, *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8.

⁴⁶ 老舍，《貓城記》，同註16，頁28。

⁴⁷ 同前註，頁29。

⁴⁸ 常見的用法是利用同音諧義來點明作者隱含之意指。《紅樓夢》中所謂「甄士隱」（真事隱去）「賈雨村」（假語村言），已見此特色。而晚清小說中，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主角稱作「九死一生」者，亦為此類。

⁴⁹ 對一個想像的世界而言，勉強追求同音的符合只是徒費精神，甚至可能破壞讀者閱讀時已然接受的文類定規，因此在此文類中，歐威爾與老舍的作法應是較恰當的。

二、傳統敘述者的運用

研究中國敘事文體的學者，咸以為從傳統「文以載道」到以強調個人解放自由主義，即敘述者立場的轉變，是區隔晚清與五四兩時期重要指標之一。⁵⁰此一標準基本無誤，但並非全然有效。就晚清而言，作者試圖維持以鼓吹社會改革，重建道德秩序，但在傳統價值觀受到強烈挑戰之際，小說作品敘述者往往以渾沌不明，甚至顛覆性（reversed）立場出現。而五四時期強調自由與主觀色彩，卻有基於個人因素而有具有強烈是非立場的作品。

《貓城記》便是與時代精神，甚至作者個人風格明顯差異的作品。或許基於此，即便對晚清與老舍作品荒誕色彩之關聯有深刻認識，王德威在其滑稽鬧劇風格現代小說的評論中，不得不將《貓城記》排除在外。⁵¹但無論王氏的考量標準為何，有十分明確且容易認知的一點是：《貓城記》立場鮮明且正經嚴肅的敘述者，不容讀者以幽默輕鬆的態度面對，並以大量評論文字介入敘事，限制鬧劇色彩的呈現。以前述大使妻妾情節為例，當讀者準備領略其中幽默諷刺情緒時，「我」隨即迅速出現阻止：

我難過極了！公使太太的一段哀鳴，使我為多少世紀的女子流淚，我的手按著歷史上最黑的那幾頁，我的眼不敢再往下看了。⁵²

這種富有正義感的敘述者，顯然是受五四追求解放，猛烈攻擊傳統傾向的影響。⁵³書中女性被壓迫的意見，具體反映出將傳統女性定位於愚懵無知，並與國家衰弱原因等同的歪曲見解。⁵⁴就此而言，《貓城記》可做為例證，說明在反對舊有道德禮教精神下，五四如何形成另一思想性薄弱但同屬強制性的社會規範，並將文學貶抑成手段工具。

就藝術價值而論，《貓城記》的敘述者，不僅降低作品諷刺意義，也減少讀

⁵⁰ 見 Jaroslav Průšek, "Subj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rchiv Orientalni* 25 (1955): 261;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頁4-8。

⁵¹ 在王氏關於《貓城記》的研究中，有較多寫實主義而非荒誕描寫的討論。見 David D. W. Wang, 1992, 同註45, 135-9.

⁵² 老舍，《貓城記》，同註16，頁105。

⁵³ 如同老舍自己在〈「五四」給了我甚麼〉一文中所說，迫使他創作的動力，「就是非把封建社會和帝國主義所給我的苦汁子吐出來不可。」見五月四日《解放軍報》。此據周揚〈懷念老舍同志〉引，《老舍選集》，同註17，頁235。

⁵⁴ 見 Dorothy Ko, *Teacher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4) 1-2

者自我詮釋空間，並不是值得稱許的設計。誠如佛萊（Northrop Frye）所言：「諷刺與其他作品不同，沒有幽默的攻擊，或單純的謾罵，並不算是諷刺。」⁵⁵《貓城記》敘述者議論往往就顯示這樣的缺失。以學生解剖校長老師情節為例，作者意在諷刺當時教育制度及理念，本身意義十分深刻，但敘述者卻出現，以極穩定的道德判斷發出下述意見：

怎麼回事呢？噢，疑心！藐小！狡滑！誰是校長？他們彼此指了一指。剛活過命來便想犧牲別人而保全自己，他們以為我是要加害校長，所以彼此指一指。偷偷的，慢慢的立起來，像蜻蜓飛跑了去！哈哈！我狂笑起來！我不是笑他們兩個，我是笑他們的社會：處處是疑心，藐小，自利，殘忍。沒有一點誠實，大量，義氣，慷慨！學生解剖校長，校長不敢承認自己是校長……黑暗，黑暗，一百分的黑暗！難道他們看不出我救了他們？噢，黑暗的社會裡哪有救人的事。⁵⁶

雖然有因想像與現實距離而產生反諷效果的議論，但是卻因明確的指向及道德觀念而限制其作用：

我落下淚來，不是怕，是想起來故鄉。光明的中國，偉大的中國，沒有殘暴，沒有毒刑，沒有鷹吃死屍。我恐怕永不能再看那塊光明的地土了，我將永遠不能享受合理的人生了；就是我能在火星上保存著生命，恐怕連享受也是痛苦吧！⁵⁷

⁵⁵Frye，同註 27，224

⁵⁶老舍，《貓城記》，同註 16，頁 121。

⁵⁷同上註，頁 9。

與老舍其他早期小說如《離婚》、《二馬》相較，《貓城記》並未使用其較擅長、具有豐富話語內涵及辨證潛力的敘述者角色，而更類似中國傳統小說中，以旁觀者出現，具有明確道德意識及是非態度，如〈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中的說話人。⁵⁸

然而就回歸道德意識，企圖重建某種社會秩序而言，《貓城記》與 1927 年後創造社作家群仍有不同；甚至與 1942 年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後老舍自己作品相比，亦有明顯差異。即便是以「載道」為創作中心，《貓城記》亦非為某種特定政治思想服務，而較接近於傳統「公心諷世」的創作理想。同時，也可以發現作者身處變局中不滿與焦慮。⁵⁹也因此，敘述者言論雖然尖刻，語調（tone）卻十分淒婉悲涼。在見到「貓國」頹唐墮落的社會時，發出如此感慨：

一眼看見貓城，不知道為什麼我心中形成了一句話：這個文明快要滅絕！……文明與民族是可以滅絕的，我們地球上人類史中的記載也都是玫瑰色的。讀歷史設若能使我們落淚，那麼，眼前擺著一片要斷氣的文明，是何等傷心的事！將快死去的人還有個回光返照，將要壽終的文明不必是全無喧囂熱鬧的。一個文明的滅絕是比一個人的死亡更不自覺的，好似是創造之程已經把那毀滅的手指按在文明的頭上，好的，——就是將死的國中也有幾個好人罷——壞人，全要同歸於盡。那幾個好的人也許覺出呼吸的緊促，也許已經預備好了絕命書，

⁵⁸ 亦名〈錯斬崔寧〉。本篇在話本小說中以其說話人明確的道德議論著稱，例如在縣官枉殺崔寧後，敘述者言道：「看官聽說，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與崔寧謀財害命時節，他兩人須連夜逃走他方，怎麼又去鄰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卻被人捉住了？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糊塗，只圖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斷獄，任情用刑，也要求個公平明允。道不得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可勝嘆哉！」有關評論與情節呈現不同模式在傳統小說的分化情況，可參見韓南，〈早期中國短篇小說〉，張保民、吳兆芳合譯，《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台北：聯經，1979），頁 7-8。關於老舍作品中敘述者與傳統說話人的關係，可參見 David D. W. Wang, "Storytelling Context in Chinese Fiction: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It as mode of Narrative Discourse," *Tamkang Review* XII (1984-5): 133-50.

但是，這幾個人的悲吟與那自促死亡的哀樂比起來，好似幾個殘蟬反

抗著狂猛的秋風。⁶⁰

對世局絕望感促成對個人命運的反省，使得《貓城記》的敘述者進一步接近傳統小說，尤其是如〈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紅樓夢》及《老殘遊記》中的說話人。若以心態而論，《貓城記》似乎更接近劉鶚《老殘遊記》所謂「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的感受。

但作者是否因此對社會改造抱持悲觀，而走向求個人超脫呢？從老舍創作歷程中，可以發現並非如此。雖然《貓城記》結局是悲觀的，但是這種悲觀仍只能視為一種預警，而非預言。顯然，不論如何悲觀，作者仍在尋求個人與社會整體的和諧與共存。如在觀察種種腐敗不合理社會現象後，敘述者言道：

太悲觀有甚麼好處呢？自然我是來自太平快樂的中國，所以我總以為貓國還有希望；沒病的人是不易了解病夫之所以那樣悲觀的。不過，希望是人類應有的——簡直的可以說是人類應有的一種義務。沒有希望是自棄的表示，希望是努力的母親。我不相信貓人們如果把貓力量集合在一處，而會產不出任何成績的。有許多許多原因限制著貓國的發展，阻礙著政治入正軌，據我看到的聽到的，我深知他們的難處很少（案：疑為「多」之誤），但是貓人到底是人，人是能勝過一切困難的動物。⁶¹

這種表面上自我矛盾態度，從個人與群體衝突對立角度是不易理解的。誠如

⁵⁹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二八」事變發生，上海商務印書館遭日軍炮火炸毀，使老舍即將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長篇小說《大明湖》與單行本《小坡的生日》紙型被焚無存。這個打擊加深了老舍對局勢的憤慨，同年八月，乃有《貓城記》於《現代》雜誌連載。

⁶⁰ 老舍，《貓城記》，同註16，頁60。

⁶¹ 同上註，頁143。

白芝指出，傳統敘事文學中，即便是在個人與社會發生嚴重衝突的悲劇，如《紅樓夢》之類作品，作者甚或讀者也往往會從另一個層面，包括想像世界中，尋求與整體的和諧關係。⁶²「貓國」滅亡，表面上似乎反映作者對社會整體腐敗現象的排斥，實際卻表現了相同理念。唯一的不同，僅是《貓城記》的想像世界並非寄託個人理想，相反的是投射作者的不滿。但在這樣設計中，「貓國」的滅絕，即作者對社會不滿怨怒的化解，並期待新社會誕生，反而成爲合理的結局。

雖然因《貓城記》非自傳體小說，不應將書中敘述者與作者完全等同，但仍可判定敘述者確實反映老舍創作時期之心態與想法。而《貓城記》的悲觀色彩，並非出自對改革行動的絕望心理，而是屬於個人無法推動社會改革，只能隨整體一起沉淪的悲淒無力感。至於反對黑暗並期待社會的進步，敘述者則始終義正詞嚴，其立場更是明確而不容懷疑的。

三、關於《貓城記》文學地位之商榷

《貓城記》出現後，帶給文學研究批評相當多困擾，主因在文本詮釋及社會接受程度在內種種矛盾現象。然而，上述分析已釐清一些困惑。首先，在文本所受影響方面，雖然《貓城記》如同晚清小說一般，受西方文學影響痕跡斑斑可考，但是在主題、思想及風格態度上，不能不說仍保留中國固有傳統小說格局與特色。因此在「繼承傳統」這方面來說，可以肯定《貓城記》在延續固有文學傳統上的成就。

其次，爲何在實驗性、個人主義仍舊盛行的新文化運動中期，老舍卻創作出這樣一部傳統式的小說呢？除了五四初期提出的社會改革理念，中晚期逐漸成爲文學創作定規之外，老舍創作時心態以及文類本身限制，對此疑問提供了重要線索。也即是說，老舍在創作時強烈對社會責任感，使其無法按著西方烏托邦諷刺的表現方式，將中國描繪成鬧劇式動物社會，而完全不提供任何解決之道。因此在主題意識呈現上，老舍採取接近傳統「載道」爲主的敘述者。這樣的作品，雖然反映作者複雜而值得玩味的心理層面，以及深刻曲折的時代意義，然而就藝術本質而論，不免與人矛盾之感。

讀者反應亦反映這樣的矛盾。誠如多數學者及作者本人所承認，老舍雖然是具有創作及表現天才的作家，卻非嚴肅的思想家。其所表現出悲觀性嘲諷，滿足一般讀者對國事的痛恨不滿心理，以至於《貓城記》在當時大受歡迎。但是對亟於「救亡圖存」的知識分子與批評者而言，不能單純滿足於心理層面發洩，而無法在小說中找到積極可行的改革意見。此外，傳統詩教無法接受的鬧劇性諷刺，又明顯無法與悲觀敘述者風格一致，種種因素都使當時批評者無法對《貓城記》持贊同正面態度。

⁶²參見 Birch, 1977, 同註 10, 387.

這並非說《貓城記》並不存在積極創新的意義。老舍結合西方烏托邦式鬧劇諷刺描寫與傳統戚婉態度的敘述人，創造一種全新作品風格，對中西傳統同時造成了特殊顛覆性影響。當鬧劇伴隨悲觀且正襟危坐的敘述者一起出現時，動搖了讀者熟悉的文學閱讀成規，並開始懷疑鬧劇是否真是鬧劇，而敘述者是否真的代表作者意見。雖然這並非老舍當初創作意圖，然而今天閱讀《貓城記》，可以看出這位敘述者「我」，因時代因素改變，亦成了一位被諷刺的人物。這種在中國小說傳統來說陌生的結合，在西方文學中卻早有如賽萬提斯(Miguel Cervantes de Saavedra)的《唐吉訶德傳》(*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的例子。這或許解釋對能夠跳脫諷刺世事格局來看《貓城記》的西方讀者，為何給予此書如此好評。⁶³

伍、結論

布斯(Wayne C. Booth)曾言：「一件作品是否被稱為諷刺，端賴讀者是否能掌握(作者創作時)意圖的合理線索。」⁶⁴但由於老舍身處正是一個中西文化交融混雜，文化傳統力求改變的時代，要正確合理掌握《貓城記》的諷刺線索，顯然並不容易。本文雖不否定以西方文學角度解讀《貓城記》的成就，但是卻反對採取某些外在文本(external context)⁶⁵的片面說法，將《貓城記》解讀成純粹西方式烏托邦諷刺，甚至並不相干的反面烏托邦小說。

其次，就中國文學研究而言，《貓城記》之所以在東方學者討論中被單一片面化解釋，除了政治鬥爭及作品本身所引發誤解外，是否也應考慮對傳統文學，尤其是想像世界為主題的作品特色發掘不足，以至無法適切提供合理研究角度的問題。實際上，《貓城記》成為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發展例證，即任何傳統並無法任意割裂，甚至對於身處急欲求新求變的時代的作者而言，傳統仍會默默然而持續的發揮影響力。因此，無論對傳統文學的整理詮釋，或古典及現代文學間交互影響的角度，或許都應為中國敘事文類及其發展尋找更恰當的研究模式。

⁶³除西方文學觀念對諷刺文類接受尺度不同外，翻譯者的生花妙筆恐怕也是重要的因素。此書英譯 *Cat Country*，由 William A. Lyeil, Jr. 所譯，並交由俄亥俄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於1970年出版。

⁶⁴ “Whether a given word or passage or work is ironic depends, in our present view, not on the ingenuity of the reader but on the intention that constitute the creative. And whether it is seen as ironic depends on the reader’s catching the proper clues to those intentions.” Wayne Booth, *A Rhetoric of Iro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91.

⁶⁵同上註，頁95。在此指老舍本人對《貓城記》的定位與闡釋。

參考文獻

中文資料

- 《老舍研究資料》（北京：北京實業出版社，1983）。
- 王潤華，《老舍小說新論》（台北：東大出版社，1995）。
-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
- 老舍，《老牛破車》（香港：南國出版社，1976）。
- ，《貓城記》（香港：匯通書局，1973）。
- 何冠驥，〈《桃源夢》與《遠方有個女兒國》〉《中外文學》十九卷，第五期，1994，23-45。
-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41-70。
- 李豐楙，〈六朝道教洞天說與遊歷仙境小說〉，《小說戲曲研究》第一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3-52。
- 阿英，《晚清小說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7）。
- 胡適，《胡適文存》（台北：遠流出版社，1988）。
- 張惠娟，〈反烏托邦文學的諧擬特質〉《中外文學》，十七卷，第八期，1993，頁131-46。
-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台北：久大出版社，1990）。
- 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1897-1916（北京：北大出版社，1997）。
- 舒濟編，《老舍選集》（台北：大台北出版社，1990）。
- 楊小定，〈論烏托邦旅程〉，陳鵬翔、張靜二編《從影響研究到中國文學》（台北：書林書局，1992），頁155-80。
- 溫儒敏，〈論老舍的文學世界〉，《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1997，第七期，頁383-96。
- 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里仁書局，1992）。

英文資料

- Bakhtin, M. M.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elene Iswolsk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 Birch, Cyri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Fic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Ed. Goldman, Mer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77. 385-404.
- Booth, Wayne. *A Rhetoric of Iro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 Clark, John. *The Modern Satiric Grotesque and Its Tradition*.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1.
-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Milena. "Narrative Modes in Late Qing Novels." *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Ed.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 57-75.
-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57.
- Hillegas, Mark. *The Future as Nightmare: H. G. Wells and the Anti-utopians*. Carbondale: Edwardsville, Southern III UP, 1967.
- Holquist Michael. 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by M. M. Bakhtin*.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 Ho, Koon-ki Tommy. "Cat Country: A Dystopian Satire." *MCL* III (1987): 71-89.
- Howe, Irving. "The Fiction of Antiutopia." *The Decline of the New*. New York: Harcourt, 1970. 64-74.
- Hsia, C. T.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 Jameson, Fredric.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1971-1986*. 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 Ko, Dorothy. *Teacher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4.
- Lopez-Morillas, Juan. "From 'Dreams of Reason' to 'Dreams of Unreason.'" *Survey* 18 (1972): 47-62.
- Munro, S. R. *The Function of Satire in the Works of Lao She*.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Press, 1977.
- Průšek, Jaroslav. "Subj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rchiv Orientalni* 25 (1955): 261-283.
- Vohra, Rabir. *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74.
- Wang, David D. W. "Radical Laughter in Lao She and His Taiwan Successors." *Worlds Apart: Recent Chinese Writings and Its Audience*. Ed. Howard Goldblat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0. 44-52.
- 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Storytelling Context in Chinese Fiction: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It as Mode of Narrative Discourse.” *Tamkang Review* XII (1984-5): 133-150.

Williams, Raymond. “Utopia and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5 (1978): 203-14.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17-38, No.7, Nov. 2003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Lao She's *The City of Cat* and Utopian Satire

*Heng-Hsing Liu**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Lao She's *The City of Cat* of 1933, the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ism of which are now dominated by two discourses with two relative, yet different views of utopian satire and anti-utopian fiction. I first examine both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contexts of the novel. They are significant i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ity of Cat* as utopian satire. In other words, illuminating viewpoint notwithstanding, this novel is in fact different from anti-utopian fiction in its political intention, satiric target, and narrative tone.

Then I examine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utopian fiction of both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s to determine the way in which the author, Lao-she, and his *The City of Cat* were influenced. I argue that, while many believe contemporary writers were eager to learn literary thoughts and techniques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still had strong influence on Lao She, a writer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Keywords: Lao She, *The City of Cat*, Satire, Utopia, May-Fourth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hung 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